

印尼地方政治與2019年總統大選之實證研究： 侍從主義的解釋觀點*

游雅雯

國防大學國際安全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印尼總統佐科威於2014年首次贏得總統大選後，在2019年再次勝選並連任。有別於既有文獻以社群媒體、認同政治、經濟投票等因素來解釋佐科威於2019年勝選連任的可能原因，本文利用縣市層級的資料，探討侍從主義如何對於佐科威競選連任的選舉表現造成影響。本文主張，在佐科威執政前的恩庇侍從關係，主要強調社區與個別地方政治人物的角色；而在佐科威執政期間，可觀察到政黨在侍從主義網絡的運作發揮更積極主動的角色，在全國大選幫助佐科威獲得更多選票。雖然目前也有文獻從侍從主義的角度解釋佐科威的選舉表現，但這些文獻大多為個別城市或區域之描述性研究，系統性的實證研究尚付之闕如。為了補充此學術空缺，本文利用縣市層次之資料，對於侍從主義所產生的選舉效應進行驗證。本文的實證分析發現，首先，佐科威在其政黨聯盟執政的縣市獲得較多選票；其次，當一個縣市的議會有愈多佐科威政黨聯盟的議員，佐科威在該縣市獲得較多選票；第三，當一個縣市在佐科威第一任期獲得愈多公共預算，佐

* 感謝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113-2410-H-606-010-MY2）的經費支持，使本研究可以順利完成。在此同時也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使本文的研究假設及實證分析得以更加完備。惟本文之可能的疏漏與錯誤，概由本人負責。

科威在該縣市獲得較多選票。綜言之，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從侍從主義的角度，對於佐科威2019年的選舉表現提出重要的補充觀點。

關鍵詞：佐科威、侍從主義、政黨、總統大選、印尼

* * *

一、前言

印尼是全球人口第三大的民主國家，也是最大的穆斯林國家（Muslim-majority countries）。2019年的總統大選是印尼自1998年轉型為民主國家後的第四次全國大選，佐科威（Joko Widodo，以下簡稱：Jokowi）的競選連任成功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Arifianto 2019; Fionna and Hutchinson 2019）。在2014年印尼總統大選中，佐科威總統以政治素人的身份當選（La Porta 2014, 1; Sherlock 2015, 23）。許多研究指出，他出身平民所展現的勤奮、個人魅力和親和力，使其贏得了選民廣泛的支持（Aspinall and Mietzner 2014; Hadiz and Robison 2017; McRae 2013, 293; Mietzner 2014, 115; Sefsani and Ziegenhain 2015, 22）。此外，有學者指出佐科威的正面形象在社交媒體上被強力宣傳，使他在總統競選過程中獲得了優勢（Brajawidagda and Chatfield 2014; Holmmes and Sulistyanto 2016），甚至有人將這一現象稱為「佐科威現象」（Jokowi Phenomenon）（Tapsell 2015）。

在2014年與2019年的總統大選中，佐科威的主要競爭對手皆為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¹普拉伯沃擁有強大的家族勢力和軍方網絡（Mietzner 2015, 39），但在兩次大選均敗北。既有文獻針對2019年佐科威在印尼總統大選勝選的因素進行探討，目前學者提出的解釋，包括社群媒體宣傳

¹ 普拉伯沃現為大印尼運動黨（Gerindra）的主席，為印尼政治強人蘇哈托（Suharto）的前女婿。他本身財力雄厚，個人財富約為1.47億美元（Aspinall and Mietzner 2014, 352）。普拉伯沃的弟弟哈希姆（Hashim Djojohadikusumo）是印尼富商，擔任過普拉伯沃競選活動的經濟顧問。普拉伯沃在2014年的選舉搭檔為前經濟協調部長哈達（Hatta Rajasa），而在2019年，普拉伯沃的選舉搭檔是雅加達首都特區副省長、亦為名列印尼50大富豪榜之一的桑迪阿加烏諾（Sandiaga Uno）。

(Abdurrahman, Ruchianderan, and Samputra 2021; Damayanti, Santoso, and Hamzah 2021; Wahyuni et al. 2021)、認同政治(Marsanty et al. 2022; Arifianto 2020; Pepinsky 2019)與經濟投票(Amri and Damuri 2019; Yustisia, Putra, and Hakim 2023)。儘管上述文獻一定程度已為2019年的選舉結果提出了解釋，這些文獻大多從全國性的角度進行分析，較少從縣市層次的角度分析各地選舉結果的差異。本文主張，為了更深入探討2019年大選中佐科威的選舉表現，有必要從地方政治及侍從主義(clientelism)的角度進行分析。²

既有文獻指出，侍從主義為印尼「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Aspinall 2013, 28; Finan and Schechter 2012; Klinken and Berenschot 2018, 153)。儘管目前也有一些文獻從侍從主義的角度解釋佐科威在2019年的選舉表現，但這些文獻大多聚焦於個別城市或區域之描述性研究(Burhani 2022; Irawanto 2022; Supriatma 2022)，系統性的實證研究付之闕如。為彌補上述文獻的不足，本研究將從侍從主義的觀點，探討佐科威在縣市層級選舉表現的差異。具體來說，本研究試圖探討：侍從主義網絡的運作是否有助於佐科威的選舉表現？若有，侍從主義產生多大的影響？本文主張，佐科威在一個縣市的得票表現與三個因素密切相關：一、該縣市是否由同屬佐科威陣營的首長所執政；二、該縣市有多少佐科威陣營的議員；三、該縣市從中央獲得多少公共預算。本研究利用縣市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佐科威在其政黨聯盟執政的縣市獲得較多選票；其次，當一個縣市的議會有愈多佐科威政黨聯盟的議員，佐科威在該縣市獲得較多選票；第三，當一個縣市在佐科威第一任期獲得愈多公共預算，佐科威在該縣市獲得較多選票。

為何有必要從地方政治及侍從主義的角度來研究佐科威2019年連任選舉的表現？從全國數據來看，佐科威在2014年總統大選時已獲得過半的選票支持(53.2%)，2019年的得票率些許進步到55.5%，看似並無太大的差異。但若我們比較佐科威總統在兩次選舉時「縣市層級之得票率」，則會發現有值得深

² 事實上，侍從主義可說是印尼政治人物在中央選舉及地方選舉所使用的主要選舉策略。換言之，不論是在中央層級或地方層級的選舉，印尼政黨與政治人物的選舉策略差異不大。

究之處。首先，佐科威於2014年在印尼全國497個縣市之中有331個縣市得票率過半，佔全國總縣市66.6%；2019年，佐科威在497個縣市之中有288個縣市得票率過半，佔全國總縣市57.9%，上述數據顯示了佐科威於2014年的民意基礎並未完全移轉到2019年。

其次，在全印尼497個縣市中，有315個由支持佐科威的首長所執政，2019年佐科威在這些縣市的平均得票率比起2014年的平均得票率增加了2.13%。另外，在182個由不支持佐科威縣市首長所執政的縣市中，佐科威在2019年的平均得票率比起2014年的平均得票率減少了2.45%。³這個證據初步顯示侍從主義對於佐科威的得票率有正向效果。⁴

但如果進一步來看，可發現2019年在315個由支持佐科威的首長所執政的縣市，其中只有在173個縣市的得票率高於2014年，約佔55%。換言之，即使支持佐科威的縣市首長可以透過侍從主義網絡為佐科威助選，但侍從主義對佐科威選舉表現的效果並非是絕對性的。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從縣市層次去深入研究，以檢證侍從主義是否能夠作為解釋佐科威的連任成功之關鍵因素。⁵

我們的統計分析顯示，當縣市首長為其同政黨聯盟者、縣市議員多屬於佐科威的政黨聯盟時，以及在佐科威第一任期時獲得較多中央預算的縣市，佐科威在這些縣市獲得較高的得票率。因此，本文發現侍從主義確實對於佐科威

³ T檢定的結果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p=0.002$ ）。

⁴ 我們若以蘇門答臘（Sumatra）為例，比較佐科威於2019年及2014年在各縣市得票率變化較大的縣市。2019年得票率顯著高於2014年得票率的前三名縣市為Nias Bar（差距為9.38%）、Humbang（差距為5.12%）、Samosir（差距為3.61%），這些縣市的首長皆屬於佐科威陣營。反之，2019年得票率顯著低於2014年得票率的前三名縣市分別為：Labuhan B. Selatan（差距為-17.73%）、Asahan（差距為-13.39%）、Deli Ser（差距為-1.05%），這些縣市的首長皆屬非佐科威陣營。以上證據亦顯示侍從主義對於佐科威的得票率應有正向效果。

⁵ 有一位匿名審查人質疑為何本文選擇研究侍從主義對佐科威在2019年選舉的影響、而非2014年選舉？我們認為這是因為佐科威在2014年參選總統時，他尚未擁有全國性的行政優勢及資源，亦無法建立其恩庇侍從網絡。但在2014年他當選總統後，在其第一任期（2014~2019）時，他可利用透過總統職位去影響與同政黨聯盟的省市長及縣市議會，同時也影響中央對地方的預算分配，因此，我們希望藉由縣市層級資料來檢證侍從主義是否對於佐科威2019年在各縣市的得票率有所影響。

2019年的選舉表現有顯著效果。此說明了未來研究印尼選舉時，不應僅關注全國層次的解釋面向，也應從地方層次切入探討影響全國選舉的侍從主義因素。

本文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節為前言，介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動機。接著，第二節探討既有文獻對於2019年佐科威勝選所提出的不同解釋觀點。第三節討論印尼侍從主義的歷史發展及運作方式，說明侍從主義的理論觀點對解釋佐科威勝選之適用性，並據此提出研究假設。在第四節中，我們說明本研究的實證設計並提出分析結果。最後一節為結論，總結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及研究貢獻。

二、既有文獻的觀點

有關影響佐科威在2019年總統大選勝選之因素，既有文獻所提出的解釋包括：社群媒體宣傳、認同政治與經濟投票。首先，社群媒體已經成為總統候選人政治宣傳與造勢的主要溝通媒介，原因在於社群媒體的傳播迅速、涵蓋範圍大，而且有效（Aminulloh et al. 2021, 137）。印尼的候選人通常使用WhatsApp、Facebook和Twitter與選民聯繫，社群媒體儼然成為印尼選戰的核心策略（Holmmes and Sulistyanto 2016）。根據2019年印尼網路服務工商協會（APJII）的民調報告顯示，2018年印尼網民數量較前一年增長了10.12%，累計網民總數達到1.7億人（Anggraheni, Setyowati, and Harry 2022, 1）。另外，根據Zuhdi等人（2023, 196）的研究指出，截至2022年全球網路使用者數將達到49.5億人，而印尼更是全球擁有網路使用者最多的國家，僅在印尼就有2.1億人使用網路。

Damayanti、Santoso以及Hamzah（2021）的研究發現，社群媒體是佐科威競選團隊與支持者之間的主要互動平台，佐科威競選團隊將活動訊息傳播到社交平台，廣泛流傳邀請民衆參與造勢活動，快速傳播到整個印尼的各個階層，最後佐科威競選團隊只用一週時間便成功吸引了超過16萬名志願者和支持者的參與挺佐科威的大型活動（Damayanti, Santoso, and Hamzah 2021, 7）。根據Hui（2020）的研究指出，佐科威在2019年總統大選期間的社群媒體宣傳團隊是由遍佈印尼各地約莫8,000名「網軍」所組成。Wahyuni、Prihantoro以及

Ohorella (2021) 探討佐科威競選團隊如何在大雅加達城市區 (Jabodetabek)⁶ 透過社群媒體作為競選工具以吸引年輕選民支持佐科威；Abdurrahman、Ruchianderan，以及Samputra (2021) 則關注佐科威團隊在巴布亞 (Papua) 如何利用社群媒體進行政治溝通之策略。綜言之，目前有不少研究認為佐科威的競選團隊善用社群媒體進行宣傳，成功地宣揚其政治理念並大幅增加人氣，應是其贏得連任選舉的重要因素。

其次，有學者從認同政治角度解釋2019年的選舉過程。印尼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全國穆斯林人口將近88%，因此，伊斯蘭議題常在選舉中被熱烈討論，也導致了政治極化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alahudin et al. 2019)。一些研究發現，印尼的政治極化現象到了2019年印尼總統大選期間達到高峰 (Warburton 2020, 28)。儘管兩位候選人都是穆斯林，但佐科威被普拉伯沃陣營描繪成「反伊斯蘭」的形象 (Arifianto 2020)。普拉伯沃指出，由於佐科威對於非穆斯林及少數族群比較友善，若佐科威當選，將會對印尼穆斯林社群 (Ummah) 以及伊斯蘭宗教組織形成威脅 (Pepinsky 2019)。這個選舉策略獲得了印尼最大伊斯蘭政黨—「繁榮正義黨」 (Partai Keadilan Sejahtera, 英文翻譯為Social Justice Party, 簡稱PKS) 的支持，吸引不少穆斯林支持普拉伯沃 (Saputra, Setiawan, and Herpina 2021)。

另一方面，佐科威為了反制普拉伯沃陣營，宣稱若普拉伯沃當選將導致印尼成為伊斯蘭哈里發國 (caliphate)，危及印尼的多元族群與文化 (Marsanty et al. 2022, 77)，此舉造成非穆斯林及少數族群對於普拉伯沃陣營非常警戒。反之，佐科威在2019年總統選舉中特意邀請了一位伊斯蘭宗教學者擔任副手，這個人就是「伊斯蘭學者理事會」 (Majelis Ulama Indonesia, MUI) 的主席阿敏 (Ma'ruf Amin)。佐科威欲以此證明自己非常重視伊斯蘭，而且他在選舉前一日的冷靜期還前往麥加朝聖，以打造他是「虔誠穆斯林」的形象。

再者，佐科威陣營還有兩個重要的伊斯蘭盟友——一個是溫和派的伊斯蘭政

⁶ 大雅加達城市區 (Jabodetabek) 由雅加達及其周圍的特大城市組成，其範圍包括雅加達 (Jakarta)、茂物 (Bogor)、德博克 (Depok)、唐格朗 (Tangerang)、勿加西 (Bekasi) 等地區。

黨—「民族覺醒黨」(*Partai Kebangkitan Bangsa*，以下簡稱：PKB)，另一個是伊斯蘭宗教組織—「宗教學者聯合會」(*Nahdlatul Ulama*，以下簡稱：NU)，他們透過一些清真寺及伊斯蘭寄宿學校等網絡動員穆斯林投票支持佐科威。從2019年印尼大選的選舉結果來看，佐科威最後是憑藉NU及PKB等溫和伊斯蘭勢力的支持，穩固了中爪哇、東爪哇的選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印尼研究專家Thomas Pepinsky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的社論指出：2019年佐科威依賴於位於東爪哇及中爪哇的選票，而其中大多數為「非穆斯林」地區的選票。對比來看，普拉伯沃則是依靠PKS的人脈網絡，獲得了位於西爪哇、蘇門答臘、亞齊等地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支持(Pepinsky 2019)。

另外，印尼學者Marsanty等人(2022)的研究發現，佐科威具有斯文有禮、腳踏實地的形象，反映了一種*merakyat*(印尼文，意指與人們親近、受歡迎的)的爪哇人形象，使不少爪哇人認為他會是一個好的領導者(Marsanty et al. 2022, 77)

既有文獻解釋佐科威勝選的第三個解釋是從「經濟投票」(economic voting)的觀點出發，主張佐科威在擔任總統的第一任期表現良好，讓選民對佐科威的執政有信心。經濟投票理論的基礎的是理性選擇論，主張選民會在競選期間會對各政黨產生出不同程度的偏好，並排列出優先順序(Downs 1957, 38-49)，並在投票日投給自己偏好的政黨及候選人。在諸多影響投票抉擇的因素裡，短期經濟表現良好與否，更會影響選民是否支持執政黨(Fiorina 1981, 89-90; Wattenberg 1994, 15)。⁷具體來說，選民在投票時會回溯思考該候選人的表現，而他們對候選人未來可能創造的效益之評估，以及對候選人的期待乃是建立於過去的經驗(Fiorina 1981, 145)。同理來說，若候選人的施政無法滿足於選民，執政者的經濟表現差，他們則用選票懲罰他(Key and Cummings 1966)。以回溯性投票的邏輯來看，此次印尼總統大選可說是對佐科威總統第一任期施政績效的「信任投票」。換言之，經濟投票理論認為若執政黨在前次任期時的經濟表現較好，則會對於選民的投票行為產生影響，吸引

⁷ 有些執政者會藉由刺激短期經濟表現達到連任的目的，形成「短期經濟循環」(electoral-economic circle)週期現象(Tufte 1978)

選民投票支持執政黨的候選人。

Yustisia、Putra，以及Hakim（2023）根據印尼全國民調數據研究經濟投票理論來解釋2019年選舉的結果。作者發現，經濟因素與現任候選人的選票之間存在顯著的直接關聯。他們分析了三個經濟變數，包括客觀的個人經濟狀況（即家庭收入和支出的金額）、個人對自己經濟狀況是否優渥的主觀評估，以及個人對國家整體經濟是否發展良好的主觀評估。實證分析顯示，客觀的個人經濟狀況以及個人對印尼當前經濟狀況是否感到滿意的主觀評估，與其是否投票給佐科威之間的關係存在統計上的顯著性（Yustisia, Putra, and Hakim 2023）。另外，Amri以及Damuri（2019）使用2018年印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民意調查數據，研究經濟因素對於選民投票傾向之影響。該民調是在2018年4月在五個主要省份（西爪哇、東爪哇、中爪哇、北蘇門答臘和南蘇拉威西）進行，樣本涵蓋了印尼全國70%的選民，其分析結果顯示，經濟因素與選民的選舉偏好關係呈現統計上的顯著性。他們進一步分析得出，那些認為印尼經濟發展良好的人與那些認為印尼經濟發展不好的人相比，前者投票給佐科威的比例較後者多了14%。

不論是強調民粹主義與社群媒體的運用、認同政治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或是經濟投票奏效等文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2019年的選舉結果提出了解釋，但是，由於這些文獻多著重在全國層次的得票率，卻忽略了地方政治脈絡對於選舉結果的影響。為了補充既有文獻的不足，本文假設侍從主義之地方網絡運作會影響佐科威於不同縣市的選舉結果差異。下一節，我們將探討侍從主義的概念、侍從主義在印尼的歷史發展及現況，以及侍從主義與選舉結果之間的理論關係，並據以提出可供驗證的假設。

三、侍從主義的解釋觀點

（一）侍從主義的概念界定

在建立本研究的理論假設之前，有必要先針對侍從主義的概念以及印尼侍從主義的現況進行討論。首先，恩庇侍從關係可以定義為「政治人物分配給個人選民、競選工作人員或捐助者利益，以換取其政治支持」的關係（Hutchcroft 2014, 177; Martin 1994）。在這個定義中的「利益」，可能包括

現金、商品、服務和其他經濟利益，例如工作和契約（Aspinall and Sukmajati 2016a, 3-4）。此外，Allen Hicken（2011）認為侍從主義有四個組成部分：一、「二元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s）：亦即侍從主義是由酬庸者（patron）與隨從者（client）二元互動之後所形成的關係；二、「互惠關係」（reciprocal relations），亦即商品或服務的交付是對於彼此提供互惠利益的直接回應；三、「階層關係」（hierarchy），亦即酬庸者與隨從者的結盟為不平等之主從關係，在其中，酬庸者具有決定如何互動與合作的權力與資源；四、「疊代」（iteration）亦即酬庸者能提供侍從者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如此才能夠重複性地、一次又一次地維持恩庇侍從關係（Hicken 2011, 290-292）。

雖然恩庇政治時常與買票和貪污腐敗劃上等號，但恩庇政治包涵的範圍更廣泛，其中也包括候選人試圖透過提供商品和服務來促進當地發展。目前學界有不少文獻探討發展中國家或新興民主國家的恩庇侍從政治（Bustikova and Corduneanu-Huci 2009; Elvira et al. 2018; Hilgers 2012; Keefer 2007; Kitschelt and Wilkinson 2007; Mares and Young 2019）。然而，即使是在美國這樣的已開發民主國家，「肉桶政治」（pork barrel）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另外，過去的研究多將恩庇侍從關係視為會對民主政治中產生負面影響的弊端，但如Edward Aspinall以及Mada Sukmajati所言，我們並不能將金錢政治（money politics）以及買票（vote buying）與侍從主義劃上等號（Aspinall and Sukmajati 2016a, 2）。

（二）印尼的侍從主義

長期以來，印尼的恩庇政治根深蒂固，其務實、互惠的本質，被認為是一種自然關係（Finan and Schechter 2012）。Edward Aspinall（2013, 28）曾指出，印尼政客通常依靠恩庇侍從關係來保證他們在選舉中獲勝；Klinken和Berenschot認為，印尼公民與權力持有者之間的關係通常是施加恩惠者和接受恩惠的從屬關係（Klinken and Berenschot 2018, 153）。對此，Berenschot（2018）稱之為「印尼的恩庇民主」（Indonesia's patronage democracy）。

從歷史上來看，關於印尼侍從主義的研究，起源於1959年Clifford Geertz的「流派政治」（aliran politics）。Geertz將「流派」（aliran）定義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他提到不同流派又與一些社區組織／志願性組織或政黨有密

切聯繫，進而形成「支柱式侍從主義」（pillared clientelism）（Geertz 1959, 37）。這種以流派及社區／志願團體為基礎的侍從主義，在本文的定義上，可稱作印尼的「舊侍從主義」。

印尼流派政治盛行於獨立後的議會民主時期（1945～1959）及「指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時期（1959～1965），其盛行的原因在於當國家無法立即且有效地處理地方問題時，村里人民需要透過與自己流派相關的地方社區志願團體來協助處理修路、修橋、及提供各種緊急救助（Aspinall 2013, 32-33）。在蘇卡諾時期，爪哇島上的主要社區志願團體為印尼穆斯林聯合會（*Partai Majelis Syuro Muslimin Indonesia, Masyumi*）以及宗教學者復興會（*Nahdlatul Ulama*），而主要的政黨組織則包括印尼民族黨（*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 PNI*）、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印尼流派政治一直延續至今，仍具政治影響力。Fossati（2019）以2017年的民調資料指出，儘管印尼已經歷過蘇哈托威權時期，但流派政治依然沒有間斷地影響印尼人民的政治偏好，甚至對選民投票行為也有深遠的影響。

Aspinall及Berenschot（2019）的侍從主義專著，⁸關注印尼的政治人物如何運用網絡連結與利益分配，來交換選民的支持選票並贏得選舉，但他們認為印尼多以「社區」（community）作為選舉動員的基礎，而非「政黨」，顯見他們關注在印尼的「舊侍從主義」。

然而，本文發現2019年選舉時印尼侍從主義已有新的型態，佐科威競選團隊開始以「政黨」取代社區志願團體作為選舉動員機器。基於此，本文將以政黨為基礎的侍從主義稱作「新侍從主義」。其實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侍從主義動員基礎皆為政黨（Ames 1994; Calvo and Murillo 2004; Kopecky 2011; Hiskey and Moseley 2020; Scheiner 2005），或地方強人（local strongman）（Baldwin 2013; Koter 2013; Reuter 2013; Sidel 2005）。舉例而言，Ames（1994）對於巴

⁸ Aspinall及Berenschot（2019）針對丹格朗（Tangerang），楠榜（Lampung），加里曼丹（Kalimantan），泗水（Surabaya）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同時也利用「專家訪談」（expert survey）蒐集問卷資料，訪談範圍包括印尼的38個縣市選區，遍佈16個省，最後發展出「侍從主義知覺量表」（The Clientelism Perception Index, CPI），用以測量不同地區的侍從主義程度。

西總統大選的研究發現，與總統候選人同黨的地方政治領導人，可充分運用地方政治網絡發揮政治影響力，為同黨的總統候選人進行有效的選舉動員，其實證分析顯示，在由總統候選人所屬政黨人士擔任縣市長的縣市，該黨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會在那個縣市獲得較高的選舉支持。無獨有偶，以上這種現象，我們可在2019年佐科威競選總統過程中時常發現。

在印尼選舉政治中，學者研究發現候選人的競選策略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空中競選」（*kampanye udara*），另一為「陸地競選」（*kampanye darat*）（Sefsani and Ziegenhain 2015, 25）。空中競選是指候選人通過廣播、電視和社群媒體，例如WhatsApp、Twitter、Facebook及YouTube來宣傳自己，吸引人們的支持。而陸地競選基於面對面的競選策略，包括候選人公開演講與人民接觸，或者其競選團隊舉辦公開活動、私人聚會、上門拜訪，或透過個人網絡與選民直接接觸。很明顯地，侍從主義網絡與陸地競選的成功與否，息息相關。

Aspinall（2014）與Aspinall及Sukmajati（2016b）討論了候選人所籌組的競選團隊，在印尼脈絡中被稱作「勝利團隊」（*tim sukses, success team*）。印尼的胜利團隊是指總統候選人和地方領導人組成一種恩庇侍從網絡，總統候選人尋求地方政治機器的背書以贏得地方人民的選票和支持，而地方政治精英則希望從中央政府獲得特權和資源。具體來說，總統候選人會在每個縣市中選擇一些已有固定人際網絡的代表，而這些代表會在村落（*desa*）或鄉村（*kampung*）地區招募更基層的樁腳以籌組勝利團隊。勝利團隊將管理與競選相關的一切事務，包括候選人的日程安排、競選活動、廣告、法律支持和競選工作人員的動員。地方政府或區長通常會成立各個小組來處理專門的任務，例如媒體關係（Aspinall 2014, 552）。由於勝利團隊中的地方政治人物，擁有影響該地區選民的政策工具，且控制該地區的地方關係與人脈網絡，因此，他們通常樂於為其黨籍總統候選人助選，期待在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當選之後，這些地方代表可從新政府獲得基礎建設、工作機會、政府合約、地方補助款、榮譽 / 獎項 / 禮物等等。⁹

⁹ 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印尼在重大節日期間，例如「宰牲節」、「開齋節」，甚至

Dewi、Harjanto與Purba（2016）以雅加達中區及雅加達南區所建立的恩庇侍從網絡為例，他們發現在城市地區較少發現直接買票的情況，但是卻有許多分配物資、給予社區小規模的建設之情形，而里長、鄰長通常就是擔任地方樁腳的角色。Dewi、Harjanto與Purba（2016）透過參與觀察與訪談，歸納候選人有四種競選策略：一、候選人會先鎖定哪些區域是他們較有機會勝選的區域，通常是以上一次選舉的成績來判斷。二、候選人會組成「勝利團隊」專門派員去接觸他們鎖定的區域之內的民衆。勝利團隊由里長、鄰長為首，再加上多數志工。依據不同候選人的資源雄厚程度，有些會給里長、鄰長固定的薪資，因為他們是負責去組織志工及思考如何動員群眾的主要人事，他們也要評估自己能為候選人獲得多少選票。三、候選人及其勝利團隊會製作旗幟、海報及其他宣傳品，極盡全力讓候選人獲得高曝光度。例如有一位PDIP候選人還付錢給道路清潔工，請他們每天穿著印有候選人頭像的衣服來清掃馬路。另一位PKS候選人則是發送免費的辣椒醬給群眾，他們認為辣椒醬是每個人生活必吃的東西，如此一來每次民衆看到辣椒醬就會想到這位候選人。四、勝利團隊還會舉辦許多民衆見面會，讓民衆有機會親自見到候選人（Dewi, Harjanto, and Purba 2016, 170-172）。

（三）佐科威主政下的侍從主義與研究假設的建立

沿襲印尼舊侍從主義的政治運作傳統，佐科威在2014年總統大選期間先透過志願團體（*relawan*）的動員與支持來進行競選活動（Fukuoka and Djani 2016; Suaedy 2014; Ziegenhain 2017），因為當時的佐科威尚未有全國級的行政資源。當時支持佐科威競選總統的志願團體包括「超級印尼人民聯盟」（*Aliansi Masyarakat untuk Indonesia Hebat*）¹⁰、「佐科威的使者」（*Duta Jokowi*）¹¹、「組織網絡和印尼公民社區國家秘書處」（*Seknas Jokowi*）

「浴佛節」等宗教節日前後，都可以看到「舉辦義診」、「發放救濟物資」，甚至幫助弱勢族群之活動，這些活動體現了印尼的主要幾個傳統文化中包括「合作」、「互利」或「利益共享」等精神。我們認為，若從恩庇侍從的角度來看，有些政治人物的確會花費較多資源在上述的社會活動，因為透過舉辦上述活動可以有效進行政治動員，可能會對其選舉表現有所助益。

¹⁰ 這個團體的主要支持網絡為「印尼學生行動陣線」（*Front Aksi Mahasiswa Indonesia*）。

¹¹ 該組織是由基督教組織—印尼主教會議（*Konferensi Waligereja Indonesia*）所組成的團

(*Sekretariat Nasional Jaringan Organisasi dan Komunitas Warga Indonesia*)，以及「佐科威總統志願者陣線」(*Barisan Relawan Jokowi Presiden*)等。¹²

佐科威於2014年當選總統之後，曾在2016年7月時進行第二次內閣改組，任命一位因侵犯人權案而備受爭議的退休將軍Wiranto為「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務部」部長。Power (2016)認為，佐科威任命Wiranto的主要理由，很有可能是想借重Wiranto的政治實力為2019年的總統選舉預作準備。Power (2016)也指出，佐科威對於2014年曾經在總統大選期間贊助佐科威的競選活動的捐助者、盟友和籌款人，包括Rini Soemarno, Luhut Panjaitan和Amran Sulaiman等政經精英。因此，Power (2016)認為雖然人們普遍認為佐科威是一位廉潔溫和的改革者，但他仍會利用勝利團隊及樁腳之間進行利益交換，跟以往印尼政治人物並無不同，而這也反映了印尼所謂的“*Politik Balas Budi*”（亦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傳統文化。印尼科學研究所 (LIPI) 的政治觀察員Fachry Ali將此現象描述為「政治互惠」，他認為這是印尼政治之中理所當然的現象。¹³由這些證據可知，佐科威會給予勝利團隊的人一些獎勵，因為這些人對佐科威的勝選有功，而且本質上也是他的核心競選團隊。

從我們在移地研究時蒐集到的資料來看，在2014年選舉時較支持佐科威的縣市，確實分配到較多資源以及社會支出。具體來說，佐科威在Nusa Tenggara Timur贏得了66.48%的選票，省長Frans Lebu Raya（執政期間為2008年至2018年）也是PDIP黨員。佐科威政府在選後在當地興建了第一個大壩項目，名為Raknamo Dam。佐科威曾經開玩笑指出，在大壩興建之前，Frans Lebu Raya經常打電話問他何時要興建大壩，而Frans Lebu Raya也曾表示，這個大壩項目是來自佐科威的「生日禮物」。¹⁴另一個例子是Papua，佐科威在當地獲得74.04%的選票，在選後，佐科威政府回饋給當地許多基礎建設，例如佐科威

體。

¹² 該組織在印尼19個省設有分支機構，其成員來自社會的不同階層，例如記者、政治家、演員、藝術家、律師和學生 (Ziegenhain 2017, 272-273)。

¹³ 相關新聞報導請參考<https://www.bbc.com/indonesia/indonesia-50135001> (Accessed on September 25, 2023)。

¹⁴ 請參見<https://nasional.tempo.co/read/629872/bendungan-kado-jokowi-untuk-ntt/full&view=ok> (Accessed on September 25, 2023)。

在Pasar Praha以及Jayapura地區免費為居民興建市場攤位，讓人民直接受到回饋。¹⁵由上可知，佐科威在勝選之後會對於這些特別支持他的地區給予較「優惠」的待遇，藉以佈建並強化侍從主義網絡。

2015年，佐科威政府表示為了慶祝印尼獨立70週年，為44位在公共事務有傑出成就的人士頒發總統府授予的榮譽獎章，¹⁶其中有13人獲頒「重要服務勳章」（*Bintang Jasa Utama*）；而在這13人之中，有4位都來自佐科威的政黨PDIP，分別是中爪哇省的省長Ganjar Pranowo，加里曼丹省的省長Cornelis，東努沙登加拉省的省長Frans Lebu Jaya，以及泗水市的市長Tri Rismaharini。雖然佐科威政府聲明這些授勳皆通過政府單位與民間團體長達數個月「公平且公開」的審查，但仍被外界批評為酬庸。¹⁷

在上述4位地方首長中，於2019年佐科威競選連任時仍擔任地方首長的是中爪哇（Jawa Tengah）省長Ganjar Pranowo以及泗水市（Surabaya City）市長Tri Rismaharini。Ganjar Pranowo是一位PDIP資深黨員，也是前國會議員。他與佐科威在擔任梭羅（Solo）市長時期相識，佐科威之所以能獲得PDIP政黨提名也是靠他的幫忙；在2014年及2019年總統大選期間，Ganjar Pranowo可說是為佐科威在中爪哇「固票」的功臣。¹⁸2014年，佐科威在中爪哇省獲得60.52%的選票支持，而2019年佐科威在該省的得票率高達77.10%，表現大幅進步。另外，Tri Rismaharini亦為PDIP資深黨員，在2014年及2019年總統大選期間，皆為支持佐科威競選團隊的重要成員；¹⁹許多新聞報導指出，她與佐科威時常在公開場合連袂出席，強力動員泗水選民在總統大選投票支持佐科威。²⁰

¹⁵ 請參見<https://nasional.tempo.co/read/631287/jokowi-bagi-bagi-hadiah-untuk-para-mama-di-papua/full&view=ok> (Accessed on September 25, 2023)。

¹⁶ 請參見https://www.setneg.go.id/baca/index/presiden_jokowi_anugerahkan_tanda_kehormatan_kepada_46_tokoh (Accessed on September 25, 2023)。

¹⁷ 請參見<https://nasional.kompas.com/read/2015/08/13/17595621/Politisi.PDI-P.dan.Pendukung.Jokowi.Terima.Penghargaan.Ini.Penjelasan.Istana> (Accessed on September 25, 2023)。

¹⁸ 請參見：<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commentary/indonesia-president-election-2024-ganjar-anies-prabowo-jokowi-party-3451466> (Accessed on September 25, 2023)。

¹⁹ 請參見：<https://en.tempo.co/read/921836/dahlan-iskan-risma-join-jokowi-maruf-campaign-team-in-e-java> (Accessed on September 25, 2023)。

²⁰ 請參見：<https://news.detik.com/berita/d-4411506/jokowi-kampanye-bareng-risma-dan->

Risma志工團隊協調員Mat Mochtar明白指出，佐科威在東爪哇的志工團隊不斷壯大，主要可歸功於泗水市長Risma對該團隊提供重要的公務協助。²¹在泗水市，2014年佐科威獲得64.14%的選票支持，而2019年佐科威則獲得70.16%的選票。由上述簡短的事實描述可知，在2019年總統大選時，印尼已朝向新侍從主義模式—政黨儼然成爲建立恩庇侍從網絡以及動員選票的基礎。於是，我們可以發現若一個地區的行政首長爲PDIP黨籍，其與佐科威會有較緊密的侍從關係，則佐科威在該地區容易獲得較高的選票支持。

對此，我們從2019年大選期間的實地觀察發現，印尼的恩庇侍從關係的載體已從社區志願團體與個別政治人物轉向政黨組織。因此，我們看到在佐科威競選連任總統期間，雖然社區與個別地方政治人物的角色在侍從主義網絡中不可忽視，但政黨組織在侍從主義網絡運作上已發揮更積極主動的角色。我們在實地研究時發現，爲了增加知名度，PDIP的政治人物會將自己的宣傳海報放上政黨旗幟及總統候選人佐科威的相片。與佐科威相同陣營的政黨也會挹注政黨資源及人脈，幫自己助選同時，也幫總統候選人佐科威拉票，使得以政黨機器爲主的侍從主義網絡逐漸成形。從「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的民調資料來看，²²若比較2006年與2018年的印尼民調結果，在有政黨認同傾向的受訪者中，當他們被問到「如果明天就是全國大選，你會投票給哪一個政黨」時，2006年的民調顯示有6.85%的受訪者回答會投給PDIP，但在2018年民調顯示高達34.34%的受訪者回答會投給PDIP。由此可發現，認同PDIP的印尼民衆比例從2006年到2018年之間增加了將近五倍。由上述統計資料可推知，以政黨爲基礎的動員模式，對於佐科威2019年大選的選情應有正面的效應。

我們以下再舉一個例子闡述黨籍政治人物如何透過選舉動員拉抬佐科威的

addie-ms-di-surabaya; <https://wow.tribunnews.com/2018/09/20/jadi-juru-kampanye-jokowimaruf-wali-kota-surabaya-tri-rismaharini-saya-siap-cuti> (Accessed on March 15, 2023)。

²¹ 請見<https://mediaindonesia.com/nusantara/151870/relawan-risma-siap-menangkan-jokowipada-pilpres-2019> (Accessed on March 15, 2023)。

²² 請見WVS第五波及第七波中的印尼民調資料，<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DocumentationWV5.jsp>; <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DocumentationWV7.jsp> (Accessed on August 31, 2023)。

選情。在馬杜拉島（Madura island），總共有四個縣市，分別是Bangkalan、Sampang、Pamekasan和Sumenep。在2019年總統選舉，普拉伯沃陣營在這四個縣市皆贏得壓倒性的支持。在Bangkalan，佐科威在2014年只贏得了18.8%的選票。但在2019年大選卻贏得57.74%的選票，主要原因就是2018年新上任的縣長Abdul Latif Amin Imron幫忙佐科威進行競選動員。²³ Abdul Latif Amin Imron是團結發展黨（*Partai Persatuan Pembangunan*, PPP）在馬杜拉島的競選總部主席，他在2018年9月一上任，立即表示因為他所屬政黨PPP是挺佐科威政黨聯盟的一員，而且由於他擔任佐科威在當地競選總部的主席，為佐科威助選不餘遺力，最後成功幫助佐科威在Bangkalan拿下過半數的選票。

Abdul Latif Amin Imron擔任縣長時，主要利用家族既有的政治勢力與宗教影響力，並結合侍從主義網絡為佐科威助選。在馬杜拉島上，99.5%的民衆都是穆斯林，因此伊斯蘭學校主管與政府工作人員在馬杜拉島的影響力都非常大。²⁴ Abdul Latif Amin Imron出生於當地的名門望族，為馬杜拉島上最受尊敬的伊斯蘭宗教學者（*kiai*）Syaichona Cholil的曾孫，Abdul Latif Amin Imron的哥哥是2003年到2013年擔任過縣長的Fuad Amin Imron，其姪子Makmun Ibnu Fuad在2013年到2018年也擔任過Bangkalan縣長。Abdul Latif Amin Imron家族也是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的重要成員，其家族血統與伊斯蘭背景備受當地人推崇。²⁵在馬杜拉島上，伊斯蘭宗教學者的政治影響力有時甚至超過法律（Lücking 2016, 14），另也有學者指出，馬杜拉人特別遵從當地領導人和伊斯蘭宗教學者的指示，所以，Abdul Latif Amin Imron表態支持佐科威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Burhani 2022, 223）。

綜上所述，既有文獻以社群媒體、認同政治、經濟投票等因素來解釋佐科

²³ 請見印尼新聞報導：Bupati Bangkalan Mendukung Jokowi-Makruf Amin, Ini Alasannya (The Regent of Bangkalan Supports Jokowi-Makruf Amin, Here's the Reason), <https://mata-maduranews.com/bupati-bangkalan-mendukung-jokowi-makruf-amin-ini-alasannya/#gsc.tab=0> 24/09/2018 (Accessed on August 5, 2023)。

²⁴ 請參見<https://jatimnet.com/sosok-ra-fuad-berpengaruh-atas-kemenangan-jokowi-di-bangkalan> (Accessed on March 15, 2023)。

²⁵ 請參見<https://tirto.id/sejarah-hidup-fuad-amin-wafatnya-sang-penguasa-bangkalan-madura-eifT> (Accessed on March 15, 2023)。

威勝選的可能原因，但這些研究多著重在全國層次的解釋，可能忽略了地方政治脈絡對於選舉結果的影響；雖然目前也有文獻從侍從主義的角度解釋佐科威的選舉表現，但這些文獻大多聚焦於個別城市或區域之描述性研究（Burhani 2022; Irawanto 2022; Supriatma 2022），系統性的實證研究付之闕如。爲了補充既有文獻的不足之處，本研究從侍從主義的理論視角出發，試圖驗證侍從主義之地方網絡運作會影響佐科威在不同縣市的選舉結果差異。

更精確地說，本文將從「縣市長是否爲佐科威的政黨聯盟」、「佐科威政黨聯盟在各縣市所掌握的議席比例」，以及「佐科威第一任期給予各縣市的公共支出人均金額」來探究印尼地方政治對佐科威選舉表現發揮之效應。首先，本研究主張，在佐科威陣營所執政的縣市，其地方首長有更強的動機在選舉中運作侍從主義網絡，積極拉攏選民支持佐科威，進而有助於提高該縣市對佐科威的支持程度，這是因爲若佐科威在陣營的縣市長助選有功，將有利於未來向中央政府爭求更多預算及補助。其次，本研究亦主張，當支持佐科威的執政聯盟議員在一個縣市議會中的比例越高時，代表支持佐科威的侍從主義網絡將能更有效運作，進而能提高佐科威在該縣市的得票率。第三，本研究強調，在佐科威第一任期（2015～2018）中獲得較高公共預算支出的縣市，在佐科威連任選舉中會有更高的支持度，這是因爲中央預算補助可用來作爲運作侍從主義網絡的重要工具，當佐科威政府對特定縣市分配更多的直接利益，將有利於交換更多的選舉支持。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三個可驗證的理論假設：

假設1：當縣市長屬於佐科威陣營時，佐科威在該縣市會有較高的得票率。

假設2：當縣市議會有愈多支持佐科威的議員，佐科威在該縣市會有較高的得票率。

假設3：當縣市獲得較高的人均公共預算時，佐科威在該縣市會有較高的得票率。

四、實證研究

(一) 研究設計

爲了驗證侍從主義對於佐科威在不同縣市的選舉結果造成多大程度的影響，本文利用縣市選區層級的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在印尼，全國大選的各地方選區爲該國的二級行政區（*Daerah Tingkat II*），也就是「縣」（*Kabupaten*）和市（*Kota*），因此，本研究實證模型之分析單位爲「縣市」，依變數爲「佐科威在各縣市的得票率」，資料來源爲印尼中央選舉委員會2019年選舉結果的官方網站。²⁶

根據前述假設，本研究將考量三個自變數。第一個自變數是縣市長的黨籍是否屬於支持佐科威的政黨（1=是；0=否），參考資料爲印尼中央選舉委員會²⁷以及印尼統計局（*Badan Pusat Statistik*），下表一列出2019年總統大選前支持佐科威的各政黨。如果該假設得到支持，則預期該變數的係數值將爲正向。²⁸

表一 2019年總統大選前表態支持佐科威陣營的政黨

政黨中文名稱	政黨英文名稱	簡稱
印尼民主奮鬥黨	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Struggle	PDI-P
人民心聲黨	People's Conscience Party	Hanura
國家民主黨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asDem
民族覺醒黨	National Awakening Party	PKB
印尼公正團結黨	Indonesian Justice and Unity Party	PKPI
從業集團黨	Party of the Functional Groups	Golkar
團結發展黨	United Development Party	PPP
印度尼西亞統一黨	Indonesia Unity Party	Perindo
印尼團結黨	Indonesian Solidarity Party	PSI
星月黨	Crescent Star Party	PBB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²⁶ <https://pemilu2019.kpu.go.id/#/ppwp/hitung-suara/>。

²⁷ 印尼中選會的正式名稱爲*Komisi Pemilihan Umum*（KPU），官方網站爲<http://kpu.go.id/>。

²⁸ 印尼統計局的官方網站爲<http://www.bps.go.id/>。

第二個自變數為佐科威政黨聯盟所屬議員佔縣市議會之比率，關於各政黨在縣市議會（DPRD）的席次資料，主要來自於《印尼眾議院、印尼省議會和縣市議會的數據資料》（Data DPR RI, DPD RI, DPRD Province, and DPRD Regency）（Ardiansa, Ardiansyah, and Samosir 2015）。然而，其中有24個縣市因為在2016年到2018年進行地方議會改選，²⁹所以我們以中央統計局（BPS）的出版物來補足這些縣市的地方議員比例資料。此外，在我們的分析資料中，有四個行政區的縣市議會資料是從其他出版品或是中央統計機構網站上取得。³⁰最後，由於我們無法從中央統計局出版品及網站中搜尋到Kabupaten Deiyai、Kabupaten Lanny Jaya、Kabupaten Mamberamo Raya與Kabupaten Nduga這四個縣市議會資料，因此將它們排除於分析之外。

第三個自變數是各縣市2015～2018年的人均公共預算支出，資料來源有二，分別是中央政府分配給各縣市的公共預算（*perimbangan keuangan*），包括中央政府向地方縣市轉移的公共預算、一般撥款和專項撥款；³¹其次是各縣市的人口總數。³²在取得這兩項資料後，我們將每年中央政府分配給各縣市的公共預算，分別除以每年各縣市的人口資料，相加之後取平均值，得出

²⁹ 24個縣市包括：Kabupaten Pesisir Barat, Kabupaten Malaka, Kabupaten Mahakam Hulu, Kabupaten Banggai Kepulauan, Kabupaten Banggai Laut, Kabupaten Morowali Utara, Kabupaten Buton Selatan, Kabupaten Buton Tengah, Kabupaten Kolaka Timur, Kabupaten Kolaka Utara, Kabupaten Konawe Kepulauan, Kabupaten Mamuju Tengah, Kabupaten Taliabu, Kabupaten Manokwari Selatan, Kabupaten Pegunungan Arfak, Kabupaten Jayawijaya, Kabupaten Merauke, Kabupaten Paniai, Kabupaten Puncak, Kabupaten Puncak Jaya, Kabupaten Sarmi, Kabupaten Supiori, Kabupaten Tolikara, and Kabupaten Yahukimo。

³⁰ Kabupaten Musi Rawas Utara的數據來自Alamudi（2016）；Kabupaten Penukal Abab Lematang Ilir（PALI）的資料來自Kabar Serasan（2015）；Kabupaten Muna Barat的數據來自Zona Sultra（2015）；Kabupaten Pangandaran的數據係來自於DPRD Pangandaran（2022）。

³¹ 這些數據是我們向印尼財政部（Perimbangan Keuangan/DJPK）的預算總局（Direktorat Jenderal）提出書面申請後，獲准進入印尼財政部網站上的「區域和鄉村基金轉移分配和實現」的頁面（alokasi dan realisasi transfer ke daerah dan dana desa/TKDD）才得以進行資料蒐集，該網頁的網址為：https://djp.kemenkeu.go.id/?page_id=41626。

³² 此資料的來源為各縣市的中央統計局網站的「社會和人口」（Sosial dan Kependudukan）頁面，我們取得的資料為2015年至2018年的各縣市人口總數。

2015~2018年的各縣市人均公共預算（單位：百萬印尼盾）。³³

除了上述的自變數之外，本研究的實證模型亦根據既有文獻納入若干控制變數。首先，爲了考量社群媒體因素對於選舉結果可能帶來的影響，本文將控制了「手機持有率」，由於印尼統計局並沒有縣市層級的手機持有率資料，因此，本文只能在模型中考量省級的手機持有率。³⁴手機爲印尼人普遍使用的資訊傳播媒介，不管是佐科威陣營或普拉伯沃陣營都會使用。但由於先前文獻指出，佐科威在使用社群媒體進行宣傳與動員，常常略勝一籌（Damayanti et al. 2021; Wahyuni et al. 2021）。因此，在手機持有率較高的地區，可能更有利於佐科威陣營進行宣傳而有較高的得票率。

其次，爲了控制族群及宗教因素對於選舉結果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我們在模型中納入兩個人口學變數：「爪哇人在各縣市所佔的人口比例」、「穆斯林在各縣市的所佔的人口比例」，資料來源爲「國際普查資料庫」（IPUMS International）³⁵的印尼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³⁶Pepinsky（2019）指出2019年佐科威的勝選依賴於位於東爪哇及中爪哇的選票，而其中大多數爲「非穆斯林」地區的選票；對比而言，普拉伯沃則獲得了位於西爪哇、蘇門答臘、亞齊等地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支持。因此，按照上述文獻，可預期在爪哇人較多的縣市，佐科威的選舉表現應較佳；而在穆斯林較多的縣市，佐科威的選舉表現應該較差。在我們的資料庫中，爪哇人比例與穆斯林比例兩個變數的相關係數僅爲0.36，沒有明顯的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疑慮，所以在模型中同時控制這兩個變數尙屬合理。

第三，爲了考量經濟投票的觀點，本文控制兩個縣市層次的經濟變數——「各縣市選前的經濟發展程度」、「各縣市選前的經濟成長率」。經濟投票理論預期，選民會根據執政黨的經濟表現來決定是否支持該政黨所提出的候選

³³ 我們感謝一位審查人提議我們建立第二個自變數與第三個自變數。

³⁴ 請見<https://www.bps.go.id/subject/2/komunikasi.html#subjekViewTab3> (Accessed on March 15, 2023)。

³⁵ 請見<https://international.ipums.org/international/> (Accessed on March 15, 2023)。

³⁶ 至2024年7月爲止，國際普查資料庫（IPUMS International）仍然只有2010年的印尼人口普查資料，2020年普查資料尙未公佈，因此，本研究使用的資料仍是2010年的普查資料。

人；因此，若以印尼為例，當選民認為經濟情況良好，則愈有可能投給佐科威（Amri and Damuri 2019; Yustisia, Putra, and Hakim 2023）。由於本研究分析單位是縣市，所以可預期如果佐科威在上任期內促進了該縣市的經濟發展，那麼這個縣市的選民就可能更傾向於投票支持他。關於2019年選前的經濟發展程度，本文是以2018年各縣市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Gross Regional Product, GRP）」採自然對數轉換後的數值進行編碼，資料來源為印尼統計局所出版的經濟財政統計資料年鑑2017~2018。³⁷關於各縣市選前的經濟成長率，我們利用各縣市在2013年以及2018年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之資料進行計算，其具體的編碼方式為：以「2018年GRP數值」減去「2013年GRP數值」之後，除以「2013年GRP數值」，再乘以100%，所以這個變數的單位是百分比。此兩個變數的編碼資料取自印尼統計局的官方出版品。³⁸

2019年印尼共有514個縣市，而2014年印尼共有497個縣市。由於本研究考量的兩個人口學變數只涵蓋2014年的資料，加上我們未能取得Kota Tanjung Balai這個縣市的人口學資料，因此，本研究的樣本總數為496而非514。下表二為本文實證分析中各個變數的描述性統計。

表二 描述性統計

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佐科威縣市層次得票率	56.733	23.995	6.822	100
縣市長的黨籍為佐科威陣營的政黨	0.634	0.482	0	1
佐科威陣營所屬縣市議員之比率	59.288	11.069	0	90

³⁷ 參考資料為Statistik Keuangan Pemerintah Kabupaten_Kota 2017~2018 Buku 1 (Sumatera, Jawa), 英文翻譯為Regency City Government Financial Statistics 2017-2018 Book 1 (Sumatra, Java), 以及Statistik Keuangan Pemerintah Kabupaten_Kota 2017~2018 Buku 2 (Bali, Nusa Tenggara, Kalimantan, Sulawesi, Maluku, dan Papua), 英文翻譯為Regency City Government Financial Statistics 2017~2018 Book 2 (Bali, Nusa Tenggara, Kalimantan, Sulawesi, Maluku, and Papua)。

³⁸ 2013年印尼各縣市的經濟發展資料來自Tinjauan Regional Berdasarkan PDRB Kabupaten_Kota 2013~2017 (英文翻譯為Regional Overview Based on 2013~2017 GRDP)。2018年印尼各縣市的經濟發展資料來自Tinjauan Regional Berdasarkan PDRB Kabupaten_Kota 2016~2020 GRDP (英文翻譯為Regional Overview Based on 2016~2020 GRDP)。

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015~2018年每年人均公共支出（百萬印尼盾）	4.357	4.867	0.488	53.450
縣市層次的經濟發展程度	9.384	1.266	5.242	13.370
縣市層次的經濟成長率	60.035	17.726	-34.683	193.841
省層次的手機持有率	87.841	7.930	58.22	96.74
縣市層次爪哇人所占比率	25.650	33.103	0	99.806
縣市層次穆斯林所占比率	75.059	33.730	0	100

資料來源：作者的資料庫。

就模型設定而言，由於本研究的依變數是連續變數，所以我們採取普通最小平方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以下簡稱：OLS）的迴歸分析模型。由於佐科威在各得票的觀察值彼此間並不相互獨立，考量以各省集群之穩健標準誤有助於控制同一群（省）內的觀察值（縣市）之殘差項（error term）有可能彼此相關的狀況。因此，我們加入Huber / White / Sandwich穩健變異的估計（robust variance estimator），並以「省」（province）（包含特別行政區）為單位予以集群（clustered），使係數估計值的標準誤在調整過後成為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本研究將估計兩個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只有考量控制變數的基本模型（baseline model），第二個模型則是同時考量自變數與控制變數的完整模型（full model），分別由以下兩個方程式所呈現：

$$\text{佐科威得票率} = \beta_0 (\text{常數項}) + \beta_1 \text{縣市層次的經濟發展程度} + \beta_2 \text{縣市層次的經濟成長率} + \beta_3 \text{省層次的手機持有率} + \beta_4 \text{縣市層次爪哇人所占比率} + \beta_5 \text{縣市層次穆斯林所占比率} + \varepsilon$$

$$\text{佐科威得票率} = \beta_0 (\text{常數項}) + \beta_1 \text{縣市層次的經濟發展程度} + \beta_2 \text{縣市層次的經濟成長率} + \beta_3 \text{省層次的手機持有率} + \beta_4 \text{縣市層次爪哇人所占比率} + \beta_5 \text{縣市層次穆斯林所占比率} + \beta_6 \text{縣市長的黨籍為佐科威陣營的政黨} + \beta_7 \text{佐科威陣營所屬縣市議員之比率} + \beta_8 \text{2015~2018年每年人均公共支出} + \varepsilon$$

(二) 分析結果

下表三呈現兩個OLS模型的結果，模型1僅考量既有文獻所提及可能影響佐科威勝選的變數（控制變數），模型2則是完整模型，考量所有自變數及控制變數。

表三 2019年印尼總統大選佐科威縣市層次得票率之實證分析

變數	模型1 (OLS)	模型2 (OLS)
縣市長的黨籍為佐科威陣營的政黨	-	3.589** (1.322)
佐科威陣營所屬縣市議員之比率	-	0.248** (0.112)
2015~2018年每年人均公共支出	-	0.423** (0.187)
縣市層次的經濟發展程度	-0.496 (0.846)	-0.013 (0.822)
縣市層次的經濟成長率	0.061 (0.083)	0.046 (0.061)
省層次的手機持有率	-0.018 (0.109)	-0.074 (0.100)
縣市層次爪哇人所占比率	0.407*** (0.041)	0.390*** (0.034)
縣市層次穆斯林所占比率	-0.615*** (0.042)	-0.599*** (0.035)
常數項	94.757*** (15.994)	76.498*** (17.705)
R-squared	0.726	0.751
樣本數	496	496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括弧內標示的是依據各省集群之穩健標準誤（clustered robust standard error）；* $p \leq$

0.1; ** $p \leq 0.05$; *** $p \leq 0.01$ 。

模型1的結果顯示，當不考量本研究的自變數時，只有爪哇人所占比率和穆斯林所占比率這兩個變數的係數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族群與宗教的社會結構因素對於佐科威的得票率具有解釋力。模型2為完整模型，³⁹其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其他的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縣市長的政黨是屬於支持佐科威陣營的政黨時，佐科威在該縣市的得票率會較高，此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更精確地來說，表三的模型2結果顯示，在其他的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一個縣市由佐科威陣營的首長執政，佐科威在該縣市的得票率平均而言會增加3.59%。其次，當佐科威陣營的縣市議員在議會中的比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時，佐科威在該縣市的得票率平均而言會增加0.25%。第三，當一個縣市在2015~2018年獲得的人均公共政府預算每增加1百萬印尼盾時，佐科威在該縣市的得票率平均而言會增加0.42%。

總體來看，模型2的結果顯示本研究提出的三個假設皆得到了實證資料的支持。此外，如表三所示，考量本研究三個自變數的模型2與沒有考量這三個自變數的模型1相比，R-squared增加了2.5%，模型2的AIC與BIC亦比模型1來得小；其次，從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 ratio test）來看，LR Chi-squared（自由度=3）為47.45， $\text{Prob} > \text{chi}^2 = 0.0000$ ，達統計上顯著。因此，適合度檢定（test of goodness-of-fit）結果顯示模型2比模型1為佳。

就控制變數的結果來看，在模型2的結果亦顯示，在爪哇人所占比率較高的縣市，佐科威的得票率也會較高，而在穆斯林所占人口比率較高的縣市，佐科威的得票率就會變得較低。至於縣市層次經濟發展程度、縣市層次的經濟成長率，以及省層次手機持有率這三個控制變數，其統計係數在模型1與模型2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爲了更進一步比較主要解釋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力的實質效果（substantive effect），我們對各個解釋變數設定不同的條件情境，探討這些不同條件對於佐科威得票率的邊際效應（marginal effect），以期能深入理解各個解釋變數的實質效果。如表四所示，在其他變數保持平均值的情況下，

³⁹ 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的估計顯示，模型2的自變數與控制變數並沒有高度多重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

當一個縣市的首長之黨籍不是佐科威陣營的政黨時，佐科威預期得票率為54.272%；而當一個縣市的首長之黨籍為佐科威陣營的政黨時，佐科威預期得票率為57.861%。關於佐科威陣營所屬縣市議員之比率，當佐科威陣營所屬縣市議員之比率為最低值時，佐科威預期得票率為41.836%；當佐科威陣營所屬縣市議員之比率為平均值時，佐科威預期得票率為56.448%；而當佐科威陣營所屬縣市議員之比率為最高值時，佐科威預期得票率為64.126%。至於2015～2018年每年人均公共支出，當人均公共支出為最低值時，佐科威預期得票率為54.980%；當人均公共支出為平均值時，佐科威預期得票率為56.458%；而當人均公共支出為最高值時，佐科威預期得票率為77.162%。

表四 解釋變數的實質效果

變數	在其他變數保持平均值的情況下所設定的條件	佐科威的預期得票率
縣市長的黨籍是否為佐科威陣營的政黨	當縣市長的黨籍不是佐科威陣營的政黨	54.272%
	當縣市長的黨籍為佐科威陣營的政黨	57.861%
佐科威陣營的縣市議員之比率	當佐科威陣營的縣市議員佔比為最低值	41.836%
	當佐科威陣營的縣市議員佔比為平均值	56.448%
	當佐科威陣營的縣市議員佔比為最高值	64.126%
2015～2018年每年人均公共支出（百萬印尼盾）	當人均公共支出為最低值	54.980%
	當人均公共支出為平均值	56.458%
	當人均公共支出為最高值	77.162%
縣市層次的經濟發展程度	當經濟發展程度為最低值	52.181%
	當經濟發展程度為平均值	56.548%
	當經濟發展程度為最高值	62.708%
縣市層次的經濟成長率	當經濟成長率為最低值	56.609%
	當經濟成長率為平均值	56.557%
	當經濟成長率為最高值	56.506%

變數	在其他變數保持平均值的情況下所設定的條件	佐科威的預期得票率
省層次的手機持有率	當手機持有率為最低值	58.759%
	當手機持有率為平均值	56.544%
	當手機持有率為最高值	55.880%
縣市層次爪哇人所占比率	當爪哇人比例為最低值	46.521%
	當爪哇人比例為平均值	56.852%
	當爪哇人比例為最高值	85.486%
縣市層次穆斯林所占比率	當穆斯林比例為最低值	100%
	當穆斯林比例為平均值	56.532%
	當穆斯林比例為最高值	41.557%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爲了進一步檢驗我們的統計結果是否會受到不同的模型設定而有所改變，我們額外進行若干穩健性檢測。首先，爲了考量到各省獨有且無法觀察到的異質性（unobservable heterogeneity）對於依變數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估計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亦即在模型3中加入各省的虛擬變數，並以雅加達特區作爲參照組（reference group）進行重新分析。在模型4，我們利用Stata軟體所提供的學生氏化殘差（studentized residuals）、槓桿點（leverage）、庫克氏距離（Cook's Distance）、和DFFITs（difference in fits）等工具偵測可能會影響迴歸分析結果的離群值，總計找出11個離群值，我們在移除這些離群值後重新估計模型。

從表五的分析來看，我們發現不論是模型3或模型4，縣市長屬於支持佐科威的政黨、縣市議員屬於佐科威陣營之比率、以及2015~2018年每年人均公共支出等變數之迴歸係數皆爲正向，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總而言之，表四的結果顯示本研究的三項假設不僅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而且自變數的結果皆相當穩健。

表五 穩健性檢測

變數	模型3 (OLS)	模型4 (OLS)
縣市長屬於支持佐科威的政黨	1.350* (0.749)	2.953** (1.125)
縣市議員屬於佐科威陣營之比率	0.104* (0.061)	0.265** (0.981)
2015~2018年每年人均公共支出	0.288** (0.133)	0.576** (0.259)
縣市層次的經濟發展程度	-0.747 (0.515)	0.581 (0.821)
縣市層次的經濟成長率	-0.067** (0.257)	0.098* (0.057)
省層次的手機持有率	0.306** (0.123)	0.361 (0.092)
縣市層次爪哇人所占比率	0.275*** (0.048)	0.398*** (0.034)
縣市層次穆斯林所占比率	-0.561*** (0.083)	-0.624*** (0.038)
常數項	79.139*** (8.239)	58.500*** (17.757)
各省虛擬變數 (雅加達除外)	有	無
R-squared	0.869	0.792
樣本數	496	485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括弧內標示的是依據各省集群之穩健標準誤 (clustered robust standard error)：

* $p \leq 0.1$; ** $p \leq 0.05$; *** $p \leq 0.01$ 。

五、結論

綜觀研究印尼2019年總統大選結果的研究，大多文獻所強調的解釋面向包括社群媒體、認同政治、經濟投票。這些觀點固然有其解釋力，但大多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地方政治及侍從主義。經由回顧那些以侍從主義觀點研究印尼2019年大選的文獻可知，其分析僅針對特定區域或城鎮之個別案例，例如（Aspinall et al. 2022），但缺乏整合性的全國性實證研究。爲了填補既有文獻的空缺，我們主張，若能考量縣市層級的侍從主義變數，並建構一個全國性縣市層級的選舉資料庫，將可透過系統性實證研究的分析，增進我們對於佐科威選舉表現之理解。因此，本研究利用縣市層次資料，探討地方政治及恩庇侍從網絡是否對於佐科威在2019年印尼總統大選的選舉表現有所影響？若有影響，侍從主義到底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呢？

本研究的「前導作業」係立基於在印尼2014年及2019年總統大選期間於雅加達和泗水的實地觀察。我們當時發現與佐科威屬於同一政黨聯盟的省長、縣市長通常在造勢場合或媒體文宣中，都會強調自己是屬於支持佐科威的政黨聯盟。一方面是他們爲了增加自己在全國層次與地方層次的媒體能見度，另一方面他們也希望獲得佐科威政府或其政黨陣營的資源挹注，也因此佐科威陣營所執政的縣市地方首長有更強的動機在選舉中運作侍從主義網絡，積極動員選民爲佐科威拉票。其次，本研究亦主張，若該縣市佐科威陣營的縣市議員在議會的組成比例越高時，挺佐科威的侍從主義網絡將能更有效運作，因此，佐科威在該縣市的得票率也將隨之提高。第三，本研究認爲，當佐科威政府在其第一任期（2015～2018）分配給某些縣市較高公共預算支出時，此將有利於交換更多的選舉支持。綜上所述，本文已驗證以下三個研究假設：一、若縣市首長的黨籍爲支持佐科威的政黨時，則佐科威在該縣市會有較高的得票率。二、若縣市議會議員屬於挺佐科威陣營的議員越多時，佐科威在該縣市會有較高的得票率。三、若縣市獲得的人均公共預算越高時，佐科威在該縣市會有較高的得票率。本研究的實證分析支持上述假設，且結果相當穩健。

本研究的獨特貢獻在於爲佐科威2019年選舉表現的相關研究補充一個有別於既有文獻的觀點。然而，本研究無意否定既有文獻的研究發現，亦無意主

張侍從主義才是解釋佐科威選舉表現的最重要關鍵因素。事實上，印尼地域遼闊，境內民族繁多，宗教信仰迥異，其複雜的社會結構與豐富多采文化已蘊含了諸多影響印尼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重要因素。⁴⁰最後，本論文對於選舉研究領域的啓發在於，未來研究者除了可以持續驗證侍從主義在印尼的政治效應之外，也可以從比較觀點出發，以系統性實證分析方法探討侍從主義的相關變數如何在其他國家的選舉造成影響。

（收件：112年3月16日，接受：113年9月24日）

⁴⁰ 我們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對此所提出的寶貴建議。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donesian Local Politics and the 2019 Presidential Election: A Clientelist Perspective

Ya-wen Yu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first winn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14, Indonesian President Joko Widodo (Jokowi) was reelected in 2019. Unlik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explains Jokowi's 2019 victory through factors such as social media, identi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voting, this article uses city/regency-level data to explore how clientelism impacts Jokowi's electoral performance. It argues that prior to Jokowi's administration,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 primarily emphasized the roles of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local politicians. During Jokowi's tenure, however, political parties played a more active role within clientelist networks, helping Jokowi secure more votes in the national election. Although some existing literature also explains Jokowi's electoral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ientelism, most of these studies are descriptive and focused on individual cities or regions, lacking systematic empirical research. To fill this academic gap, this article uses city/regency-level data to verify the electoral effects generated by clientelism.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Jokowi receives more votes in the city/regency governed by his party alliance. Additionally, the more members of the Jokowi party alliance a city/regency's council have, the more votes Jokowi receives in that county. Lastly, the more public budget a city/regency receives during Jokowi's administration; the more

votes Jokowi garners in that city/regency. In summa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significant supplementary perspective on Jokowi's 2019 electoral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ientelism.

Keywords: Jokowi, Clientelism, Political Parti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donesia

參考文獻

- Abdurrahman, Abdurrahman, Riffal Ruchianderan, and Palupi Lindiasari Samputra. 2021. "The Strategy of Joko Widodo'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n 2019 Election Winning in Papua."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Global Studies*, 4: 27-41. DOI: 10.7454/jsgs.v4i1.1041
- Aji, Nurdien, and Teguh Dartanto. 2018. "Behind the Jokowi's Victory: Did Economic Voting Matter in the 2014 Indone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 (1): 115-138. DOI: 10.4007/s41685-018-0083-3
- Alamudi, Muhamad. 2016. *Kinerja DPRD Dalam Menjalankan Legislasi di Daerah Otonomi Baru Kabupaten Musi Rawas Utara Provinsi Sumatera Selatan Belum Efektif*. Jakarta: Universitas Terbuka.
- Ames, Barry. 1994. "The Reverse Coattails Effect: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 in the 1989 Brazil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1): 95-111. DOI: <https://doi.org/10.2307/2944884>
- Aminulloh, Akhirul, Myrtati Dyah Artaria, Yuyun Wahyu Izzati Surya, Kamil Zajaczkowski. 2021. "The 2019 Indone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opaganda in Post-Truth Era." *Nyimak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1): 135-150. DOI: <http://dx.doi.org/10.31000/nyimak.v5i1.3882>
- Anggraheni, Palupi, Novi Tri Setyowati, and Harry Harry. 2021.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Indonesia: Restriction Access at Announcement Results of 2019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piration Journal*, 2 (1): 100-126. DOI: 10.56353/aspersion.v2i1.23
- Ardiansa, Dirga, Ardiansyah, Rudi, and Samosir, Heru P. 2015. *Data DPR RI, DPD RI, DPRD Provinsi, dan DPRD Kabupaten/Kota Hasil Pemilu 2014*. Depok: Pusat Kajian Politik, Departemen Ilmu Politik Universitas Indonesia.
- Arifianto, Alexander R. 2019. "What the 2019 Election Says about Indonesian Democracy." *Asia Policy*, 26 (4): 46-53. DOI: 10.1353/asp.2019.0045

- Arifianto, Alexander R. 2020. "Rising Islam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Islamic Authority in Post-Reformasi Indonesia." *TRaNS: Trans-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8 (1): 37-50. DOI: <https://doi.org/10.1017/trn.2019.10>
- Aspinall, Edward. 2013. "A Nation in Fragments: Patronage and Neoliberalism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5 (1): 27-54. DOI: 10.1080/14672715.2013.758820
- Aspinall, Edward, and Mada Sukmajati. 2016a. "Patronage and Clientelism in Indonesian Electoral Politics." In Edward Aspinall and Mada Sukmajati, eds., *Electoral Dynamics in Indonesia: Mone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Clientelism at the Grassroots*, pp. 1-38. Singapore: NUS Press.
- , eds. 2016b. *Electoral Dynamics in Indonesia: Mone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Clientelism at the Grassroots*. Singapore: NUS Press.
- Aspinall, Edward, and Marcus Mietzner. 2014. "Indonesia Politics in 2014: Democracy's Close Call."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50 (3): 347-369. <http://doi.org/10.1080/00074918.2014.980375>
- Aspinall, Edward, and Ward Berenschot. 2019. *Democracy for Sale: Elections, Clientelism, and the State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spinall, Edward, Meredith L. Weiss, Allen Hicken, and Paul D. Hutchcroft. 2022. *Mobilizing for Elections: Patronage and Political Machines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ldwin, Kate. 2013. "Why Vote with the Chie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Zambi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 (4): 794-809. DOI: 10.1111/ajps.12023
- Berenschot, Ward. 201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lientel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onesia's Patronage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1 (2): 1563-1593. DOI: 10.1177/0010414018758756
- BPS Kabupaten Kutai Barat. 2017. *Kabupaten Mahakam Ulu Dalam Angka 2017*. Kutai Barat: BPS Kabupaten Kutai Barat.

- BPS Kabupaten Banggai Kepulauan. 2016. *Kabupaten Banggai Kepulauan Dalam Angka 2016*. Banggai Kepulauan: BPS Kabupaten Banggai Kepulauan.
- BPS Kabupaten Banggai Kepulauan. 2017. *Kabupaten Banggai Laut Dalam Angka 2017*. Banggai Kepulauan: BPS Kabupaten Banggai Kepulauan.
- BPS Kabupaten Morowali. 2016. *Kabupaten Morowali Dalam Angka 2016*. Kabupaten Morowali: BPS Kabupaten Morowali.
- BPS Kabupaten Buton. 2018. *Kabupaten Buton Selatan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Buton: BPS Kabupaten Buton.
- BPS Kabupaten Buton. 2018. *Kabupaten Buton Tengah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Buton: BPS Kabupaten Buton.
- BPS Kabupaten Kolaka. 2018. *Kabupaten Kolaka Timur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Kolaka: BPS Kabupaten Kolaka.
- BPS Kabupaten Kolaka Utara. 2018. *Kabupaten Kolaka Utara Dalam Angka Tahun 2018*. Kabupaten Kolaka Utara: BPS Kabupaten Kolaka Utara.
- BPS Kabupaten Konawe. 2018. *Kabupaten Konawe Kepulauan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Konawe: BPS Kabupaten Konawe.
- BPS Kabupaten Mamuju. 2018. *Kabupaten Mamuju Tengah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Mamuju: BPS Kabupaten Mamuju.
- BPS Kabupaten Kepulauan Sula. 2018. *Kabupaten Pulau Taliabu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Sula: BPS Kabupaten Kepulauan Sula.
- BPS Kabupaten Manokwari. 2018. *Kabupaten Manokwari Selatan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Manokwari: BPS Kabupaten Manokwari.
- BPS Kabupaten Manokwari. 2018. *Kabupaten Pegunungan Arfak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Manokwari: BPS Kabupaten Manokwari.
- BPS Kabupaten Jayawijaya. 2018. *Kabupaten Jayawijaya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Jayawijaya: BPS Kabupaten Jayawijaya.
- BPS Kabupaten Mappi. 2017. *Kabupaten Mappi Dalam Angka 2017*. Kabupaten Mappi: BPS Kabupaten Mappi.
- BPS Kabupaten Merauke. 2017. *Kabupaten Merauke Dalam Angka 2017*.

- Kabupaten Merauke: BPS Kabupaten Merauke.
- BPS Kabupaten Paniai. 2019. *Kabupaten Paniai Dalam Angka 2019*. Kabupaten Paniai: BPS Kabupaten Paniai.
- BPS Kabupaten Puncak. 2016. *Kabupaten Puncak Dalam Angka 2016*. Kabupaten Puncak: BPS Kabupaten Puncak.
- BPS Kabupaten Sarmi. 2016. *Kabupaten Sarmi Dalam Angka 2016*. Kabupaten Sarmi: BPS Kabupaten Sarmi.
- BPS Kabupaten Supiori. 2018. *Kabupaten Supiori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Supiori: BPS Kabupaten Supiori.
- BPS Kabupaten Tolikara. 2018. *Kabupaten Tolikara Dalam Angka 2018*. Kabupaten Tolikara: BPS Kabupaten Tolikara.
- BPS Kabupaten Puncak Jaya. 2016. *Statistik Daerah Kabupaten Puncak Jaya 2016*. Kabupaten Puncak Jaya: BPS Kabupaten Puncak Jaya.
- Brajawidagda and Chatfield. 2014. "Roles of Social Media in Open Data Environ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2014 Indone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ing Resul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Australasi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New Zea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ttps://ro.uow.edu.a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6673&context=eispapers>
- Burhani, Ahmad Najob. 2022. "Lessons from Madura Nahdlatul Ulama Conservatism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Hui, Yew-foong, and Made Supriatma, eds., *The Jokowi-Prabowo Elections 2.0*. Singapore: ISEAS.
- Calvo, Ernesto, and Maria Victoria Murillo. 2004. "Who Delivers? Partisan Clients in the Argentine Labor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 (4): 742-757. DOI: 10.1111/j.0092-5853.2004.00099.x
- Damayanti, Novita, Prasetya Yoga Santoso, and Radja Erland Hamzah. 2021. "Viral Political Campaign: Supporters of Jokowi-Amin in Indonesi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Sri Hastjarjo, Dorien Kartikawangi, Loina Lalolo Krina Perangin-angin, Kundharu Saddhono, and Robbi Rahim eds., *ICA 2019: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CA Regional Conference*, pp. 187-193. Brussels: European Union

Digital Library.

- Dewi, Sita W., and S. L. Harjanto, and Olivia D. Purba. 2016. "Central and Southern Jakarta: Social Welfare and Constituency Service in the Metropolis." In Edward Aspinall and Mada Sukmajati, eds., *Electoral Dynamics in Indonesia*, pp. 167-183.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Singapore Press.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DPRD Kabupaten Pangandaran. 2022. *Profil DPRD*. Retrieved from: <https://dprd.pangandarankab.go.id/sejarah-dprd-pangandaran/>
- Edward Aspinall. 2014. "Jokowi Fails His First Test." *New Mandala*, October 27. <https://www.newmandala.org/jokowi-fails-first-test/> (May 13, 2023).
- Edward Aspinall. 2015. "Oligarchic Populism: Probowo Subianto's Challenge to Indonesian Democracy." *Indonesia*, 99: 1-28. DOI: 10.1353/ind.2015.0002
- Elvira, Laura Ruiz de, Christoph H. Schwarz, and Irene Weipert-Fenner. 2018. *Clientelism and Patronag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tworks of Dependency*.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 Fossati, Diego. 2019. "The Resurgence of Ideology in Indonesia: Political Islam, Aliran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8 (2): 119-148. DOI: 10.1177/1868103419868400
- Finan, Frederico, and Laura Schechter. 2012. "Vote Buying and Reciprocity." *Econometrica*, 80 (2): 863-881. <https://doi.org/10.3982/ECTA9035>
- Fiorina, Morris P.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ionna, Ulla, and Francis E. Hutchinson. 2019. "Indonesia's 2019 Elections: A Fractured Democracy?" *Asian Affairs*, 50 (4): 502-519. DOI: 10.1080/03068374.2019.1672400
- Fukuoka, Yuki, and Luky Djani. 2016. "Revisiting the Rise of Jokowi: The Triumph of Reformasi or an Oligarchic Adaptation of Post-Clientelist Initiatives." *South*

- East Asia Research*, 24 (2): 204-221. DOI: 10.1177/0967828X16649044
- Geertz, Clifford. 1959. "The Javanese Village."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Local, Ethnic and National Loyalties in Village Indonesia*. 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Culture Report Series.
- Hadiz, Vedi R., and Richard Robison. 2017. "Competing Populism in Post-Authoritaria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 (4): 488-502. DOI: 10.1177/0192512117697475
- Hamayotsu, Kikue, and Ronnie Nataatmadja. 2016. "Indonesia in 2015: The Peoples Presidents Rocky Road and Hazy Outlook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sian Survey*, 56 (1): 129-137. DOI: 10.1525/as.2016.56.1.129
- Hicken, Allen D. 2011. "Clite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1): 91-113. DOI: 10.1146/annurev.polisci.031908.220508
- Hicken, Allen, Edward Aspinall, Meredith L. Weiss, and Burhanuddin Muhtadi. 2022. "Buying Brokers: Electoral Handouts beyond Clientelism in a Weak-Party State." *World Politics*, 74 (1): 77-120. DOI: 10.1017/S0043887121000216
- Hilgers, Tina. 2012. *Clientelism in Everyday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ill, Cameron. 2010. "Indonesia's 2014 National Elections: A Quick Guide." *Journal of Democracy*, 21 (2): 20-34.
- Hiskey, Jonathan T., and Mason W. Moseley. 2020. *Life in the Political Machine: Dominant-Party Enclaves and the Citizens They Produ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lmmes, David, and Sulistyanto. 2016. "Understanding the Indonesian Mediapolis: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2014 Indonesi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municat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49 (2): 50-81. DOI: 10.13140/RG.2.2.30124.33929
- Hui, Jennifer Yang. 2020. "Social Media and the 2019 Indonesian Elections: Hoax Takes the Centre Stage." In Malcolm Cook and Daljit Singh, ed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20*, pp. 155-172.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 Hutchcroft, Paul. 2014. "Linking Capital and Countryside: Patronage and Clientelism in Japa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In Diego Abente Brun and Larry Diamond, eds., *Clientelism, Social Policy and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pp. 174-203.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Irawanto, Budi. 2022. "'Awakening the Sleeping Bull': Central Java in the 2019 Indonesian Elections." In Hui Yew-Foong and Made Supriatma, eds., *The Jokowi-Prabowo Elections 2.0*, pp. 199-219.
- Kabar Serasan. 2015. "25 Anggota DPRD PALI Dilantik." Retrived from: <https://kabarserasan.com/2015/01/26/25-anggota-dprd-pali-dilantik/>
- Key, V. O., and Milton C. Cummings.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1960*.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linken, Gerry van, and Ward Berenschot. 2018. "Everyday Citizenship in Democratizing Indonesia." In Robert W. Hefner,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Indonesia*, pp. 151-162. New York: Routledge.
- Koter, D. 2013. "King Makers: Local Leader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65 (2): 187-232. <https://doi.org/10.1017/s004388711300004x>
- Kopecky, P. 2011.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Party Patronage: Public Appointments in Ghana and South Africa." *Political Studies*, 59 (3): 713-732.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48.2011.00887.x>
- La Porta, Alphonse F. 2014. "Indone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Now A Real Horse Race?" *Asia Pacific Bulletin*, 266: 1-2.
- Lücking, Mirjam. 2016. "Beyond Islam Nusantara and 'Arabization': Capitalizing 'Arabness' in Madura, East Java." *ASIEN: The Germ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39: 5-24. <https://doi.org/10.11588/asien.2016.139.18655>
- Mares, Isabela, and Lauren E. Young. 2019. *Conditionality and Coercion: Electoral Clientelism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santy, Dea Alita, Diska Putri Pamungkas, Ayu Henidar Mulyara, Yuri Ardiana. 2022. "The Impact of the Indonesian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on Javanese

- Voting Behavior in the 2024 Election.” *Espergesia*, 9 (1): 72-80. <http://dx.doi.org/10.18050/rev.espergesia.v9i1.2088>
- McRae, Dave. 2013. “Indonesia Politics in 2013 The Emergence of New Leadership?”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49 (3): 289-304. <https://doi.org/10.1080/00074918.2013.850629>
- Mietzner, Marcus. 2014. “Indonesia’s 2014 Elections: How Jokowi Won and Democracy Survived?” *Journal of Democracy*, 25 (4): 111-125. <http://dx.doi.org/10.1353/jod.2014.0073>
- . 2015. *Reinventing Asian Populism: Jokowi’s Rise,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Indonesia*. Honolulu, HI: East-West Center.
- Muhtadi, Burhanuddin. 2015. “Jokowi’s First Year: A Weak President Caught Between Reform and Oligarchic Politics.”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51 (3): 349-368. <https://doi.org/10.1080/00074918.2015.1110684>
- Muñoz, Paula. 2019. *Buying Audiences: Clientelism and Electoral Campaigns When Parties Are Weak*.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odir, Zuly; Hasse Jubba, and Mega Hidayati. 2022. “Contesting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the 2019 Indonesian Election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West Kalimantan.” *Studia Islamika*, 29 (1): 111-142. <http://dx.doi.org/10.36712/sdi.v29i1.12940>
- Panuju, Redi. 2019. “The Comparison of Jokowi and Prabowo Subianto Exposed on YouTube.” *Jurnal Ilmu Sosial dan Ilmu Politik*, 22 (3): 245-258. <https://doi.org/10.22146/jsp.33172>
- Pepinsky, Thomas. 2019. “Islam and Indonesia’s 2019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ia Policy*, 14 (4): 54-62. <https://doi.org/10.1353/asp.2019.0049>
- . 2019. “In Indonesia, Jokowi’s Victory Reveals Shifting Voting Patterns.”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in-indonesia-jokowis-victory-reveals-shifting-voting-patterns/> (August 31, 2023).
- Power, Tom. 2016. “Cashing in: Jokowi’s Second Reshuffle is a Win for the President’s Loyalists and Financiers.” *The New Mandala*, August 8, 2016.

<https://www.newmandala.org/cashing-in/>

- Reuter, O. J. 2013. "Regional Patrons and Hegemonic Party Electoral Performance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29 (2): 101-135. <http://dx.doi.org/10.1080/1060586X.2013.780410>
- Salahudin, Achmad Nurmandi, Hasse Jubba, Zuly Qodir, Jainuri, and Paryanto. 2020. "Islamic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2019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Indonesia." *Asian Affairs*, 51 (03): 656-671. <https://doi.org/10.1080/03068374.2020.1812929>
- Saputra, Andhik Beni, Azhari Setiawan, and Hesti Herpina. 2021. "Explaining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Islam and Preacher toward Prabowo's Electoral Dominance: Evidence from Pekanbaru and Kampar." *Jurnal Politik*, 7 (1): 1-40. DOI: 10.7454/jp.v7i1.1003
- Scheiner, E. 2005. "Pipelines of Pork: Japanese Politics and a Model of Local Opposition Party Failur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 (7): 799-823.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05277020>
- Sefsani, Ririn, and Patrick Ziegenhain. 2015. "Civil-Society Support-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Indone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2014." *ASIEN*, 136: 14-22.
- Sherlock, Stephen. 2015. "Democratic Achievement and Policy Paralysis: Implications for Indonesia's Continued Ascent." In Christopher B. Roberts, Ahmad D. Habir, and Leonard C. Sebastian, eds., *Indonesia's Ascent.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Asia Pacific Series*, pp. 112-129.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 Sidel, John T. 2005. "Boss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Indonesia: Towards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Local Strongmen'". In J. Harriss, K. Stokke, and T. Olle, eds., *Politicising Democracy: The New Local Politics of Democratis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uaedy, Ahmad. 2014. "The Role of Volunteer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2012 Jakarta Gubernatorial Election."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33 (1): 111-138. <http://dx.doi.org/10.1177/186810341403300106>

- Supriatma, Made. 2022 “Money or Identity? Election Insights from South Sumatra and Lampung Provinces.” In Hui Yew-Foong and Made Supriatma, eds., *The Jokowi-Prabowo Elections 2.0*, pp. 266-282. Publisher: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https://doi.org/10.1355/9789815011371-016>
- Tapsell, Ross. 2015. “Indonesia’s Media Oligarchy and the ‘Jokowi Phenomenon’.” *Indonesia*, 99: 29-50. <https://doi.org/10.5728/indonesia.99.0029>
- Tufte, Edward R. 1978.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rburton, Eve. 2020. “Deepening Polarization and Democratic Decline in Indonesia.” In Thomas Carothers, and Andrew O’ Donahue, ed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Old Divisions*, pp.25-40. New Dangers.
- Wattenberg, Martin P. 1994.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952-199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hyuni, Sri, Edy Prihantoro, and Noviawan Rasyid Ohorella. 2021. “Political Efficacy of Jokowi-Amin Political Marketing in Social Media in the Indonesia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19 in Jabodetabe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Advanced*, 2 (3): 325-330. <http://doi.org/10.51542/ijscia.v213.16>
- Widyawati, Nina, Ana Windarsih, and Purnama Alamsyah. 2021. “Discourse on ‘Islam’ and ‘Kafir’ in 2019 Indonesia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Era.” *Proceedings of the The 2nd ICS Universitas Matara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untering Radicalism and Terrorism in the Digital Era: Reshaping a Global Peace Community*, pp. 1-21. <https://dx.doi.org/10.2139/ssrn.3763308>
- Yustisia, Whinda, Idhamsyah Eka Putra, and Moh Abdul Hakim. 2023. “What Determines Incumbent Vote in Indonesia? 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Religiousnes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Incumbent Performance.” *Analyses of Socic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23 (1): 453-473. <http://dx.doi.org/10.1111/asap.12355>

- Ziegenhain, Patrick. 2017. "The Relawan in the Indone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2014 as Drivers of Indonesian Empowerment." In Sijabat, Roesdiana, Ati Cahayani, Rusminto Wibowo, eds., *Search of Key Drivers of Indonesia Empowerment*, pp. 267-288. Jakarta: Penerbit Universitas Katolik Indonesia Atma Jaya.
- Zona Sultra. 2015. "20 Anggota DPRD Muna Barat Dilantik." Retrieved: <http://zonasultra.id/20-anggota-dprd-muna-barat-dilantik.html>
- Zuhdi, Ahmad, Cecep Suryana, Rodon Pedrason, Satriyo Sasono, and Ahmad Musabiq Habibie. 2023. "Digital Campaign: Character Branding and Framing towards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Al Qalam: Jurnal Ilmiah Keagamaan dan Kemasyarakatan*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ocial Scientific), 17 (1): 195-208. <http://dx.doi.org/10.35931/aq.v17i1.1797>